
序言：香港回歸後的傳媒和政治

陳韜文、李立峯

摘要

本文主要引用專輯及相關的研究成果來分析香港回歸後傳媒與政治的關係。香港傳媒一方面因政治權力結構的改變及中港兩地的互動而向中國大陸靠近，實行自我審查，但同時也受到本土利益、專業主義和公信力等考慮的約制，使香港傳媒與權力中心保持相對的距離。作者認為，要理解香港傳媒與政治的關係，應同時考慮影響傳媒運作的「向心力」和「離心力」，以及兩者的互動。此外，作者也談及香港個案的理論意義。

關鍵詞：香港回歸、權力結構、傳媒、政治、權力中心

陳韜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及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合著和合編專書包括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Global Media Spectacle*、《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等；曾發表不少學刊論文及書章。論文發表的學刊包括 *JOC*、*CR*、*JMCQ*、*China Quarterly*、*MCS*、*IJPOR*、*NM & S*及*AJC*等。電郵：jchan003@gmail.com

李立峯為美國史丹福大學傳播學博士，現任教香港城市大學英文與傳播學系，主要研究興趣包括政治傳播和新聞學。其著作見多本國際學術期刊，包括 *IJPOR*、*JMCQ*、*Discourse & Society*、*Media, Culture & Society*、*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New Media & Society*、*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Asian Survey*及*China Quarterly*等等。電郵：lfflee@cityu.edu.hk

Introduction to Media and Politics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Joseph M. CHAN
Francis L. F. LEE

Abstract

The authors primarily draw on the articles of the Special Issue and related works to shed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media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While most media have shifted in favor of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exercised self-censorship as the power structure is reconfigured, some others keep the power centers at arm's length for the sake of maintaining local interest, professionalism, credibility and so on. The authors argue that an understanding of media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requires the assessment of the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forces that influence the media's connection with the power centers. The article also briefly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case of Hong Kong.

Keywords: Hong Kong handover, power structure, media, politics, power center

回首香港告別殖民統治時，本地和國際傳媒紛紛猜測香港的未來走向。當時大部分的討論都瀰漫一點悲觀情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財富雜誌》(*Fortune Magazine*) 在1995年中一期的封面上宣佈「香港之死」。當時盛行的看法是中國的政治力量將會勢不可擋，香港這個蕞爾小島會淹沒在此大潮中。社會及經濟體系會向新的權力中心靠攏，香港在二次大戰後逐漸發展出來的社會和文化特色亦會隨之消失，而公民自由將大幅度削減，傳媒亦會面對諸多掣肘。

證諸回歸以來的社會現實，這些預言並非全部錯誤。香港和中國的文化差異正隨時間逐漸消滅，而香港的民主派亦經常批評香港的新聞和其他公民自由正在節節倒退。但我們不能否認，香港在回歸十年後的情況並不如某些預言般惡劣。在傳媒方面，面對政治壓力，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香港電台仍未變成官方喉舌，而《蘋果日報》仍然以支持民主及維護自由為賣點，繼續得到不少市民的歡迎。董建華管治期間，傳媒對特區政府的口誅筆伐令官員慨嘆「官不聊生、傳媒治港」。社會方面，法輪功儘管被邊緣化，但在香港仍然是合法組織。數以萬計的市民每年仍舊於維園集會紀念1989年天安門事件；而在2003年7月1日，五十萬香港市民遊行抗議《國家安全條例》倉卒立法，並由此開展了其後數年間一連串的大型民主遊行。

在過去十年間，香港的政治局勢起伏不定。透過塑造議題、為各種意見提供平台，甚至偶而推動某一行動或觀點，傳媒往往能夠左右政治大局；反過來，政治變遷亦隨時影響傳媒面對的生態，改變媒體運作。我們今年為《亞洲傳播學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編輯了一期有關香港回歸後的傳媒政治的專題論文集，收集了七篇文章，專題論述香港的新聞自由、媒介政經系統、新聞專業主義，傳媒在建構國族和本土身份認同上的角色、媒介對公民權利的論述、傳媒與政治公關，以及傳媒和民主遊行之間的關係。而為了向華文世界的傳播學者介紹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現況，我們再為《傳播與社會》編輯今期的專題論文集，其中收集了四篇《亞洲傳播學刊》上發表過的文章的擴充版，另外再加上兩篇全新的論文，討論香港公營廣播的發展和香港傳媒教育的非政治化特色。

這些論文的目的是並不是要為過去十年的香港作描述性介紹。它們每

一篇都有自己的概念重點和理論問題，強調的是基於實證材料去作分析性的討論。而作為引言，本文希望借用及集合兩次論文集裡各作者提供的材料和分析，去探討政治傳播學中一個重心理論問題，就是傳媒和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

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而自由主義新聞觀視傳媒為獨立於政治及經濟權力以外的「第四權」，以「看門狗」的姿態替公民監察政府。作為規範性理論，自由主義新聞學有其可取之處，但自由主義新聞觀並不能反映媒體和政治權力在現實中的關係。我們以下的分析在理論層面上的出發點是縱使在自由社會中，新聞媒體只能相對地獨立於政治權力以外。權力中心對傳媒有很大的牽引力量。但同時，新聞媒體亦的確不是權力中心的口舌，而各種社會和文化因素會防止媒體完全向權力中心靠攏。借用陳韜文及李金銓(Chan & Lee, 1991)的比喻，香港傳媒就像人造衛星一樣繼續圍繞著中國旋轉。要追蹤傳媒的旋轉軌道，我們就要找出各種把傳媒拉遠或扯近權力中心的力量，並明白這些力量如何交織互動。

離心力和向心力

在回歸前，陳韜文及李金銓(Chan & Lee, 1991)的《大眾傳媒和政治變遷》(*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是唯一一本論述香港傳媒和政權轉移的學術專著，而其分析架構及結果或可供我們前後對比時的一個參考。該書論述香港傳媒如何及為何改變立場，因權力結構的轉變而向新的權力中心靠攏。以「傳播媒介不規則地反映權力結構，因此對社會權力關係的轉變亦作出不規則的回應」(p. 20)為理論前提，書中指出因為權力結構在重新組合，傳媒的「新聞範式」已經在轉變，而且趨勢將會繼續。

很明顯，權力結構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在過渡期間，英國已作出撤退的準備，中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香港同時出現兩個權力中心。早於八十年代中開始，港英政府每逢重大政策都會在諮詢中國政府後才作出決定。回歸後，中國人大更有權解釋香港特區的小型憲法《基本法》。中央政府對香港重大議題如行政長官的選拔和民主化的進程又嚴加控制，並為香港的公共論述注入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等基本詞彙，甚至如「愛國」、「和諧社會」等新詞。此外，中央政府積極拉攏本地社會、經

濟和政治精英，如邀請他們成為政協委員等。被拉攏的精英當中不乏傳媒人，如1998年中國政府委任當時仍是《星島日報》持有人的胡仙為政協代表。而亞洲電視行政總裁陳永棋及現時《星島日報》的擁有人何柱國更被委任為政協常務委員。

商人挾傳媒的影響力與中央討價還價，以交換經濟利益。由此便引出馮應謙所稱的香港傳媒在回歸後「非組織性集中化」的狀況(Fung, 2007)。所謂「非組織性集中化」，是指雖然傳媒機構依然為數不少，但是它們的擁有權都「集中」在與內地有生意往來的商人手裡。久而久之，這些傳媒的取向越來越「中立」和「客觀」，結果是主流傳媒的政治意識形態趨向中間，令傳媒不如回歸前多元化。

在權力結構重組和傳媒「非組織性集中化」的情況下，香港的傳媒不單只走向中立和客觀，有些更實行自我審查。蘇鑰機和陳韜文(So & Chan, 2007)根據多次新聞人員的調查，發現2001年到2006年間，認為媒介自我審查傾向嚴重的新聞人員有差不多一倍的增長。換言之，新聞人員認為傳媒在報導中央敏感的話題時的顧忌愈來愈大，因而略去或淡化有關資訊和觀點。本文筆者曾就這個問題訪問新聞人員，發現十年前的新聞人員也有提到自我審查的問題，但是較難指出具體實例。到了回歸十週年的時候，受訪的新聞人員則較容易舉出例子。自我審查是長期纏繞香港傳媒的問題，箇中的成因離不開權力中心的震懾、籠絡和統戰作用。

不過，權力結構並非一般香港傳媒愈益親中的唯一解釋。馬傑偉和馮應謙在本期的文章中指出，長久以來，香港人對抽象的中國文化符號如萬里長城、傳統儒家學說等一直有所認同，而回歸以來香港和大陸社會交往日益頻繁，香港人透過工作和旅遊等機會親身接觸大陸社會，令香港人對中國的觀感日益正面，而傳媒亦擔當塑造市民國家認同的關鍵角色。加上中國近年的經濟發展，中港在經濟方面的分野漸漸模糊。在這些背景之下，李立峯及陳韜文的研究便曾指出民意調查顯示香港人越來越認同「中國身份」，但同時亦繼續認同「香港身份」，兩者並沒有互相排斥(Lee & Chan, 2005)。而李立峯在本期的文章提出「文化共向」(cultural co-orientation)的說法，亦與這些研究和分析一脈相承。他認為自從回歸後，香港記者和中國官員的交往日益普遍和頻繁，他們變得更

「理解」中國，導致他們較少質疑和更同情大陸和中國政府。這使得部分傳媒和新聞工作者自動地減低了對中國大陸的批評。這「文化共向」的過程解釋了為甚麼一些國家議題已經不如以往般容易產生政府和傳媒之間的爭議。

另外，我們不應該將對權力中心的保守和順從完全歸因於新的社會和政治現實，香港本土文化自有其保守的一面。回歸前後，中國大力宣揚「安定繁榮」的重要性。而事實上，追求穩定和建設經濟得到不少香港人的支持。圍繞回歸後香港三次公民權利抗爭的媒介論述，谷淑美在本期的文章就指出強調「法律和秩序」的思維一直貫穿主流傳媒中的公眾辯論。在這些公民權利抗爭中，傳媒起初或會同情示威者，但當事情發展到後來，有關秩序的論述還是會得到最後勝利。因此社會對建制的挑戰極少得到傳媒無條件的支持。這論點亦見於李立峯(2006)對香港傳媒如何報道2004年立法會選舉結果的研究。該文章指出傳媒先對「反對派」社會積極分子梁國雄的勝出給予正面的描述，但後來在出現實際爭議時卻批評他不夠「務實」和「理性」。這些研究顯示香港的公共論述背後有一些傾向保守的文化符碼。這些文化符碼往往和中國政府提倡的論述相呼應。

因此，除了權力結構的變更外，愈益頻繁的交流、文化共向和現存本土文化的保守特質等都是重要的「向心力」，統統都把傳媒拉近權力中心。

不過，如果說回歸前對香港傳媒的分析或許遺漏了一些向心力量的話，回歸後的發展顯示離心力量似乎更加被以往的分析所低估，相關的理論探討也寥寥無幾。值得注意的是，陳韜文及李金銓在回歸前的分析並沒有預期傳媒會一面倒向新權力中心。相反的力量同時存在，如有關大亞灣核電廠爭議的研究發現，當香港和大陸發生利益衝突時，商業傳媒對本土利益會變得尤其敏感。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報道的研究也發現「不同意識形態的傳媒都統一口徑」(Chan & Lee, 1991: 132)，史無前例地同聲譴責中國政府。不過，由於理論假設所限，這些現象被僅僅看成短暫的「逆行」(regression)。然而，近十年的發展卻顯示我們需要更深入地認識各種與權力中心抗衡的力量，並以理論角度審視之，因為它們提供的很可能並不只是短暫的抗衡，而是可以讓傳媒恆常地與權力中心保持一

定的距離，讓傳媒維持相對獨立的狀態。在特定條件下，它們甚至可能引領部分傳媒向新方向邁步。

那究竟主要的離心力是甚麼？首先，傳統的政經理論強調政治和經濟力量互相糾纏並互相強化，但是實際的市場運作比這更加複雜。如馮應謙所闡釋，香港的傳媒老闆有多重的商業計算 (Fung, 2007)。為了在中國經營生意 (不論是傳媒或非傳媒事業)，他們政治上都取保守的態度。然而本地市場對傳媒表現的關注同時牽制傳媒，如果市民大眾感到某傳媒出賣本土利益，他們可以選擇罷買。所以，商業考慮使傳媒機構不至於過分背棄本土利益。另外，開拓海外市場，將業務擴展至其他國家，亦可以增加收入來源。《蘋果日報》和《明報》便分別在台灣和北美發行，若它們的取向只以中國為唯一考慮，他們便要冒公信力受損的風險。因此，商業化或可稍為平衡中國的影響力。

另一抗衡傳媒服膺中國的是新聞從業員恪守之專業主義。香港新聞工作者早於過渡時期已奉自由主義新聞觀為主臬，視自己為政治傳播過程中的獨立個體，強調傳媒守門人及看門狗的角色，以防政府濫權。蘇鑰機在本期的文章分析了由1996年到2006年所進行的三次新聞工作者問卷調查，其結果顯示香港新聞從業員對專業守則的看法一直十分穩定。他們強調以事實為基礎、快捷及可靠的報道，亦認為傳媒批評政府的功能較幫助政府解釋政策來得重要。事實上，回歸初期香港遇上金融風暴，加上特區政府管治頻頻失誤，民怨開始積聚。市民對政府的不滿日增，傳媒也紛紛狠批政府，陳韜文及蘇鑰機曾以「代議民主功能」(surrogate democracy function) 的概念來解釋香港傳媒此時期的角色 (Chan & So, 2003)。由於民主制度發展不成熟，市民的意見不能有效地從議會反映，報章和電台因而變成民意代表，提供討論平台、促進官民溝通、批評政府、提出政策建議和鼓勵社會改革。傳媒的「代議民主功能」也就是專業主義的體現，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的確發揮了第四權的角色，既填補了香港缺乏民主的狀況，同時也為自己找到抗衡向權力中心靠攏的力量。

另外，面對政治環境轉變，香港的傳媒市場 (尤其是報紙) 仍算百花齊放。即使香港傳媒系統在整體而言有向新的權力中心靠近的情況，但少數傳媒機構卻可以利用政治批評作為賣點，《蘋果日報》和不少受歡迎

的電台時事討論節目便是例子。李立峯在本期的文章將這些機構和節目稱為「邊界測試者」，它們的存在有利於維持意見市場的闊度，而因為它們承擔了大部分的政治風險，其他專業中立的報紙得以卸下不少壓力。

不過，本土利益和意見必須要被清晰歸納和表達出來才会有影響力。香港傳媒到現在仍未至於唯權力中心是從，實在取決於香港公民社會的持續成長。2003年七一遊行是近年最顯著的例子。陳韜文和李立峯(2006)指出，激盪的民意在是次歷史性的遊行中強而有力地表達出來，雖然說傳媒促進了遊行，但是遊行的成功同時逼使不少傳媒機構重新考慮自己和本地民意的關係，並重塑它們的論述。

最後，香港傳媒能夠偏離權力中心的軌跡，陳韜文和李立峯(2007)認為「國際」因素極之關鍵。香港一直與國際社會有緊密接觸，接受西方的法治、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而中國承諾「一國兩制」，對香港保留的一套自然不能公然推翻，加上中國對自身的國際形象日益重視，必須一併考慮國際意見。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和美國國會每年就香港狀況發表的定期報告，都或多或少牽制中國對香港的影響，以維持香港現狀。

要舉傳媒如何以國際力量具體抗衡中國的例子，則非2003年沙士爆發的時期莫屬。沙士出現時，一如慣常做法，中國封鎖所有有關沙士的消息，但是傳聞在香港卻不脛而走。而當香港爆發沙士時，前線醫護人員則透過電台烽煙節目，譴責官員隱瞞疫情，並將疫症的最新消息帶給大眾，而《蘋果日報》更狠批大陸資訊封閉。馬傑偉和陳韜文(Ma & Chan, 2007)指出，香港和國際社會的緊密聯繫，使傳媒要與其他地方競爭最新的報道，無形中互相監察。中國政府面對國際壓力，亦不得不調整立場，向世界衛生組織交代實況。由此引申，香港傳媒不能作出過分的自我審查，因為慣常接觸國際媒體的市民會意識到香港傳媒的不當行為。另外，香港傳媒可以引用國際媒體的報道去處理有關中國的敏感問題，因而不至於變得和內地傳媒一樣，成為官方喉舌。又例如香港電台雖然屢受親中人士批評，但它卻以國際上的公營廣播傳統，尤其是以英國廣播公司為依據，在回歸初期大致可以保持其編輯工作獨立於政府。

因此，商業考慮、專業主義、多元化、公民社會的發展和國際因素等等令傳媒不能漠視本土民意和利益，向心力量並未把香港傳媒同化成

內地的一樣，傳媒在關鍵時刻——尤其是當直接受到威脅，或是本地利益與中央利益出現重要的矛盾時——甚至會和中國政府抗衡。

互動與創新

社會政治力量的重整固然為媒介的運作和公民社會設限，但這並不表示香港傳媒一定順理成章和權力中心團結一起。的確，結構因素如「一國兩制」政策和活躍的傳媒市場可以限制新聞範式轉移的速度和程度。因此，「新聞自由全無希望的斷言將不會兌現」(Chan & Lee, 1991: 146)。既然離心力和向心力同時存在，我們便需要了解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而要明白各種力量互動的過程，我們需要實證研究，探討香港政治傳播過程中的細節和其中出現的各種矛盾，找出重覆出現的圖案和過程、新冒起的現象、不同陣營的策略和在特定機制下出現的特定結果，並將各種發現概念化以增加它們的適用程度 (generalizability)，亦即是使個別研究的結果可以用來分析其他同類的現象。例如陳韜文和李立峯(2006)有關2003年七一遊行的分析發現，激盪民意的表達令媒介論述趨同，香港傳媒的政治平衡因而調整，公共論述亦重新劃界。「激盪民意」和「修正政治平衡」等概念對分析其他媒介和民意互動的研究也應有所幫助。

以研究重點來說，回歸後的政治傳播研究多從「結構」轉移至「過程」之上。谷淑美在本期的文章中展示有關公民自主的掙扎如何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呈現，便可以被看成一個過程。儘管擴大公民自主的嘗試極少成功，但是在公共論述的層面，每一次的試驗都可以引入和普及新的詞彙，如「公民抗命」、「直接行動」等；在社會層面，一些曾被視為激烈的行動，如示威遊行等，可能漸漸被視為平常或為大眾所接受。在最近的案例如保衛天星及皇后碼頭等行動中，主流傳媒的態度傾向正面。久而久之，公民社會的論述和行動便有機會變得更加豐富。整體而言，反建制論述的壯大，使挑戰者可以加以運用以支持其行動。

另一有助發展公民社會的新現象便是傳媒教育的興起，李月蓮在本期的文章指出，政權移交中國後，香港傳媒自我審查的情況加劇，而新聞也傾向非政治化；加上市場導向新聞令煽動色情及暴力的資訊泛濫，傳媒公共空間不但未能進一步發展，反而每況愈下。一些不滿意傳媒表

現的人士認為要採取積極行動以改善傳媒，故此推廣傳媒教育。公共空間的萎縮引起社會對傳媒的關注，並掀起了一場傳媒教育運動。回歸十年，接受傳媒教育的學生對批評傳媒的意識提高，更勇於學習發表意見，公民空間因而擴大。不過，李月蓮亦指出，香港的傳媒教育仍然局限於社會文化層次。學校文化的政治冷漠，回歸前固然受殖民統治去政治化的影響，回歸後中國強調香港經濟掛帥的一面，也令傳媒教育變得「非政治化」。因此，2003年七一遊行後政治環境的變化能否令傳媒教育吸納公民社會的討論，從而壯大公共空間，實在值得研究媒介政治的學者關注。

在各種各樣的轉變過程中，政治人物和傳媒往往要因應時勢而作出策略性的回應。回歸後，很多實證的新聞學研究便旨在理解香港傳媒和中國政府之間的策略互動。這些研究善於應用如「策略儀式」(strategic rituals)或「合法爭論領域」(sphere of legitimate controversy)等源自英美新聞學的概念於香港傳媒的發展上；同時亦鑄造新詞，如「策略含糊」(strategic ambiguity)和「強化客觀」(intensified objectivity)等，以捕捉一些權力中心或傳媒所使用的策略。李立峯在本期的文章集合了相關的文獻，並討論傳媒和當權者的策略互動如何模塑香港新聞自由的發展。

策略互動 (strategic interaction) 的觀點也可以應用以分析公共廣播的發展。最近香港有關公共廣播角色的檢討，又再掀起新聞自由會否收窄的關注。2006年初，特區政府成立香港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審視香港公共廣播。最後委員會認為香港電台脫離政府獨立、轉變成為公共廣播機構「並非良策」，而應組建「新的公共廣播機構」。梁麗娟在本文中指出，香港電台一直是保守勢力的眼中釘，在回歸初期，特區政府處於逆境，香港電台深得市民支持，因此未敢向它開刀，但在曾蔭權領導下的特區政府，民望高企，在強勢政府的年代，民意未必需要與媒介連成一線，特區政府借委員會整頓香港電台，民間社會未必會出現強大的阻力。港台的存廢懸於民間社會與政府角力的議價能力有多大，而這也取決於市民大眾的意向。香港電台在政府弱勢時為民發聲，獲得愛戴，但當經濟好轉，政府民望回升，市民仍否繼續支持香港電台，成為決定港台前景的關鍵，亦會是香港新聞自由發展的一個指標。

最後，持續的互動令權力中心自身也要調整其策略以適應新發展，

因此政府公關的演變尤其值得留意。利嘉敏 (Lee, 2007) 的研究指出，香港政府的公關承襲公共資訊模式的傳統，然而面對後九七的發展，這傳統已顯得不合時宜，尤其在沙士一役，董建華治下的特區政府面對危機重重。不過，無可否認，特區政府漸漸意識到公關的重要，尤其是當曾蔭權於2005年接替董為行政長官後，表現得對「民意」尤其關心。漸漸地，民意調查的走勢成為新一輪的公關戰場。政府如何採用各式各樣的公關策略，而傳媒又如何招架，肯定是香港媒介政治需要注意的另一焦點。

展望將來

我們希望以上的討論可以勾劃出回歸後香港傳媒和政治權力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無可否認，回歸後牽引香港傳媒的向心力有增無減，中國權力正式接管香港，中港頻繁的往來、文化共向和本港社會的保守元素令傳媒循著權力的軌跡而行；然而離心力量同時存在，專業主義、社會及傳媒的多元化、公民社會的發展和國際因素等都把傳媒拉遠，回歸後的香港傳媒便周旋於兩股力量之間，跟權力中心保持相對獨立的距離。

既然香港的傳媒政治仍然不斷變遷，對相關的研究和理論建構自然需求甚殷。香港地方小卻充滿活力，而傳播學研究的社群儘管相當活躍，但奈何人數不多，很多重要的現象和事件仍然有待發掘。對社會科學家來說，權力交替掀起一連串的變動和反響，香港恍如社會實驗室，因此香港的政治傳播研究也特別受社會變遷影響，而這些變遷也同時影響研究题目的發展。一些理論層面或對現實狀況的假設可能要修正、甚至要推倒重來 (Lee & Chan, forthcoming)。過渡期間政治發展如過山車般起起落落，給予研究人員豐富的素材。我們認為香港的未來將會同樣精彩，隨著中國持續的經濟增長和政策改革，內地傳媒的演變和對香港傳媒的影響值得學者密切留意。另外，自香港新一浪民主運動興起後，中國加緊籠絡香港各界，中國對港政策對本地政治傳播的影響愈見舉足輕重，理解這些影響自然十分重要。

無可否認，今期一些文章的發現是香港獨有的。但是如果我們可以

抽象地看，香港的個案實可茲其他國家參考。比如說香港和北京的關係，便猶如中央和地方政權、或是小國家和其強鄰類比一樣。而今期探討的議題如新聞自由的轉變、媒介論述和混雜身份、新聞專業主義的影響、傳媒教育、公共廣播的發展，以及霸權論述等，其他社會亦同時面對，當中的概念應該可以應用於其他社會。

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在這今期的文集未能囊括其他議題，如香港政府公關策略的變化、小眾媒體的發展和傳媒商業主義的影響等，但是這裡的六篇文章已經帶出香港的傳媒和政治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整體而言，他們展示香港傳媒仍然循著中國的軌道而行，不過歷史證明向心和離心力量隨著社會偶發的事情此消彼長，因此我們需要更全面的理論框架，去捕捉變遷中的傳媒和政治。

儘管如此，我們要強調這裡的介紹並未能將各篇文章豐富的內容呈現，而只是抽取了當中有關傳媒和權力的關係的部分加以闡述。讀者要自行翻閱，方可以對回歸後的香港傳媒和政治有更深入的了解。

參考文獻

- 李立峯(2006)。〈政治轉變中的選舉詮釋和制度修正：2004香港立法會選舉「後選戰」個案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1期，頁69-90。
- 陳韜文、李立峯(2006)。〈民意激盪中的傳媒趨同和修正政治平行——香港2003年七一大遊行個案分析〉。《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31期，秋/冬季，頁71-95。
- 陳韜文、李立峯(2007)。〈再國族化、國際化與本土化的角力：香港的傳媒和政治〉。《二十一世紀》，六月號，第101期，頁43-55。
- Chan, J. M., & Lee, C. C. (1991).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New York: Guildford.
- Chan, J. M., & Lee, F. L. F. (2007). Media and politics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An introductio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27-134.
- Chan, J. M., & So, C. Y. K. (2003). The surrogate democracy function of the media: Citizens' and journalists' evaluations of media performance. In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 S. L. Wong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1* (pp. 249-276).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Fung, A. Y. H. (2007). Political economy of Hong Kong media: Producing a hegemonic voic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59-171.

- Lee, B. K. (2007). The HKSAR government's PR sense and sensibility: Analysis of its SARS crisis management.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201–214.
- Lee, F. L. F., & Chan, J. M. (2005). Political attitud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Hong Kong identities after 1997. *Issues & Studies*, 41(2), 1–35.
- Lee, F. L. F., & Chan, J. M. (forthcoming). Making sense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A review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Hong Kong. In L. Willnat & A. Aw (E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 Ma, E. K. W., & Chan, J. M. (2007). Global connectivity and local politics: SARS, talk radio, and public opinion. In D. Davis & H. Siu (Eds.), *SARS: Re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ree Chinese cities* (pp. 19–44).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So, C. Y. K., & Chan, J. M. (2007). Professionalism, politics and market force: Survey studies of Hong Kong journalists 1996–2006.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48–158.

鳴謝

此項研究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撥款委員會 (CUHK4136/04H) 與復旦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基地的資助 (專案代碼 06FCZD0027)。本文作者承蒙英國Routledge出版社容許，根據陳韜文與李立峯 (Chan & Lee, 2007) 發表在《亞洲傳播學刊》一文改寫及擴充而成。謹此一併致謝。